

主编 唐 敏 姚承宪

新中国文学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 中 国 文 学

主 编 唐 敏 姚承宪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划为序)

郑 芳 陈子能 陈浩淦

应为众 唐 旭 钱勤来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方兴惠 杜海川 唐景华

康 威 曹毓民 董玉芬

蒋茂芳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 中 国 文 学

主 编 唐 敏 姚承宪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376号)

山东诸城教育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13印张 320千字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419—3378—3/G·2927W

定价: 6.20元

撰 稿 人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光斌	方兴惠	包 丹	陈子能
陈浩沅	应为众	杜海川	姚先登
姚承宪	唐 旭	唐 敏	唐景华
钱勤来	康 威	曹毓民	董玉芬
蒋茂芳	谭解文		

绪 论

新中国文学，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优良传统，吮吸着古往今来文学的营养。40余年来，经历了来自“左”右干扰的坎坷曲折，它终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遵循着自身的发展规律，从欢乐的诞生、剧烈的动荡、痛苦的窒息、空前的繁荣而日趋成熟。

当前，新中国文学面临着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形势，时代赋予它崇高使命。显然，我们来认清它的性质、任务、概貌、特点，以及经验教训，是十分适时和必要的。

一、新中国文学的性质与任务

新中国文学，伴随着新中国的缔造而产生，它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学。然而，从文学的自身阶段看，实际上，自1949年7月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就揭开了新中国文学的序幕。

新中国建立后，进入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中国文学，也就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现代文学，迅速转变为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新中国文学。

正因为新中国文学产生于社会主义时期，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因此，它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部分。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人民是时代的主宰，肩负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任。因而，1980年，党

中央给新中国文学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使命。这“二为”任务，同毛泽东提出的“工农兵方向”，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它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反映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变化了的阶级状况，克服了把文艺服务对象仅仅限于工农兵，这种过于狭窄的局限性，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文艺的要求。

如何贯彻执行这“二为”任务，邓小平早在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中，作了明确要求：

“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

邓小平强调：“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①新时期以来，广大作家充分施展才智，面对现实，拓宽题材，创作了大批生动感人的作品，不仅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并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四化”的大业中，起着广泛和有力的作用。

二、新中国文学的概貌

新中国文学根据新中国历史进程，并依循文学发展状况，可分为三个时期：从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为第一时期；“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为第二时期；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至现在为第三时期。因第二时期是

^①《邓小平文选》第181—182页。

百花凋零时期，在文学史上不值得单列一编，因此我们把它同第一时期合并为上编。

第一时期的“17年文学”。

这是一个除旧布新时期。建国后，一方面在文艺领域内要清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要创造优秀的文艺作品，鼓舞人民前进。

1955年前，我国文艺界相继对电影《武训传》的历史唯心主义倾向，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对胡风的文艺思想问题，进行了大规模的讨论和批判。这三次重大的文艺思想批判，纠正了学术领域中的片面认识，促进了文化遗产的研究和整理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作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但是，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混淆学术观点、文艺思想与政治问题界限的偏颇。

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对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 and 文学创作带来了蓬勃生气，然而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又使活跃的文坛，受到了摧残。

但是，革命文艺往往又按照自身的轨迹运行。建国初，广大作家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以高昂、欢乐、明朗的格调，创作了一批赞颂人民革命斗争与英雄人物的作品，讴歌了党、领袖、人民和伟大的欣欣向荣的祖国。

1957年后的10年，虽然由于“左”倾错误日益抬头，给文艺带来挫折和损害，但是由于50年代初、中期的良好基础与60年代初期文艺政策的调整，文艺创作仍然在曲折中呈现出相当繁荣的局面。

这时期，长篇小说大面积丰收，政治抒情诗兴盛，电影、戏剧和散文蓬勃发展，作家队伍壮大，许多作家以丰厚的生活积累，相当的艺术功力，创作了一系列标志着社会主义文学成就的优秀作品。

成就突出的长篇小说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孙犁的《风云初记》、曲波的《林海雪原》、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等；短篇小说有峻青的《黎明的河边》、王愿坚的《党费》、茹志鹃的《百合花》、赵树理的《登记》、李准的《李双双小传》、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等。

抒情诗歌有闻捷的《吐鲁番情歌》、郭小川的《投入火热的斗争》、《祝酒歌》、《甘蔗林——青纱帐》、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回延安》、李季的《玉门诗抄》等；叙事诗有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李季的《杨高传》、云南文工团创作的《阿诗玛》、及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等。

散文、报告文学、杂文有杨朔的《荔枝蜜》、《雪浪花》、秦牧的《土地》、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穆青等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邓拓的《燕山夜话》、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等。

戏剧、电影文学有老舍的《龙须沟》、《茶馆》、田汉的《关汉卿》、郭沫若的《蔡文姬》、沈西蒙等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广西歌剧团创作的《刘三姐》和丁洪、赵寰等的《董存瑞》、叶元、吕岩的《林则徐》等。

这时期文学突出的缺陷是：作家创作的题材、主题和人物、形式、风格都比较狭窄与单一；某些公式化、概念化、政治图解式的作品长期存在，这也就影响了文艺作品的教育功能与审美功能。

第二时期是社会主义文学大倒退的10年。

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最反动的文化政策，大搞封

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形成了新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年代。”^①他们禁绝古今中外所有的优秀文艺作品，致使大批文艺工作者遭到迫害和凌辱，文艺园地“百花凋零”，文艺界“万马齐喑”。1972年后虽有作品出现，但大部分也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目的，他们大力兜售了“阴谋文学”。然而，天安门诗歌运动敲响“四人帮”覆灭丧钟，预示着文艺春天的降临。

第三时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新时期。

党根据社会主义文学发展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加强和改善了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新时期文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文艺创作呈现全面繁荣。

新时期文学恢复和发扬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文学的现实主义力量不断加强。“四人帮”垮台后，广大文艺工作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敏锐感，正视现实，贴近人民，率先倾泄出人们长期郁积的悲愤和痛恨，写出了一大批缅怀无产阶级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抨击“四人帮”罪恶行径的作品。接着，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深入与时代发展的需要，相继创作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

1980年后，中外文化交流日益活跃，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涌入，广大文艺工作者开阔了眼界，他们在文学观念、研究方法和审美取向方面受到了启迪，并产生了迅变。当时，在文坛上掀起了传统艺术手法的突破、艺术形式的变革的探索热潮。如中国式的现代派、荒诞派、新诗潮、魔幻现实主义、生活流、意识流等竞相迭出，因而形成了1985年前后诸多文学风格、流派的繁荣景象。

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化改革，改革文学正向多面纵

①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

深展开，同时，应运而来的寻根文学、通俗文学、纪实文学，也各以其思想倾向、创作原则、表现手法争相竞秀，又相互渗透结合，崭露了当代文苑奇葩异卉、各领风骚的兴旺局面。

在当代文苑繁茂的同时，尚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有些作品宣扬资产阶级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有些描写色情、暴力，有的歧视民族传统文化，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派等等。至今，虽然问题尚未根绝，但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必定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在党的文艺方针牵引下，生气勃勃地健康发展。

三、新中国文学的主要特点

首先是题材的日益扩展和拓宽。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祖国面貌日新月异，新人新事层出不穷，文学描写的生活范围和创作领域也就不断扩大。建国后的17年，文学不仅描写革命战争和农村生活的题材有了新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以前取材较少的工业题材和没有涉及的少数民族题材，老一辈革命家题材，以及历史题材、国际题材、科学幻想题材等也展现文坛。

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文学题材得以拓宽，不少作家打破了“禁区”，创作了一批触及人民内部矛盾，描写爱情、探寻高尚道德、情操等方面的佳作。

“四人帮”粉碎后的新时期，文学题材得到广泛的开拓。首先在诗歌、话剧中产生了一批歌颂老一辈革命家、揭露“四人帮”的作品，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和苏叔阳的《丹心谱》呼出了人民的心声。1977年底起，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领域一新，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深刻揭示了“左”倾思潮对青少年的毒害与创伤。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一系列描写科学家的报告文学开拓了知识分子在科学领域里的题材。随

着，产生了如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王蒙的《蝴蝶》、古华的《芙蓉镇》等反思小说，对建国以来“左”的失误，予以冷峻的剖露。1979年以来，一批力作纷呈，如艾青的《光的赞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崔德志的《报春花》、沙叶新的《陈毅市长》等，显示了各类题材领域的宽广。

跟随时代进程，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小说，为工业改革文学开辟了新路；何士光的《乡场上》、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反映了巨大的农村变革；鲁光的《中国姑娘》、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等报告文学，描写了为国争光的体育健儿新姿；谌容的《人到中年》正视了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揭示了部队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姚雪垠的《李自成》、凌力的《少年天子》、徐业兴的《金瓯缺》等填补了新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一向被视为“禁区”的爱情题材，也得到了广泛的开放。

由于作家们勇于实践，敢于创新，不断开拓新的描写领域，能够多角度、多层面的反映纷纭复杂的社会生活，因此新时期文学已排除了17年文学中题材比较狭窄的局限。可以说，在新时期的文艺园地里，“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物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得到充分的反映。”^①

其次，是人物形象的不断丰富多彩。

在新中国人物画廊里，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物形象各具特色，17年文学的人物形象中，最突出的是塑造了一批劳动人民英雄形象。

时代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劳动人民从被奴役的地位成了国家的主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叱咤风云，主宰着时代命运，

^①《邓小平文选》第182页。

因而，他们自然成为新中国文学的重要描写对象。如朱老忠、周大勇、梁生宝、秦德贵等英雄人物。在他们身上，凝聚了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他们对党对国家赤胆忠心，既有革命气概，又有实干才智。这些走在时代前列的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此外，还塑造了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物，如林道静、董存瑞、历史人物李自成、关汉卿、况钟、林则徐、邓世昌等。也还有较典型的落后人物，如梁三老汉、赵满囤、小腿疼等，和较成功的反面人物如张灵甫、徐鹏飞、座山雕等。

随着社会主义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张扬，新时期人物形象越来越显丰富多彩。这时期老中青都奋力笔耕，精心塑造了各具类型与性格特征的艺术形象。其中，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彭德怀、陈毅、贺龙和富有开放改革精神的社会主义改革家乔光朴、李健、郑子云等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也有充满着矛盾和复杂感情的普通人物陈奂生、高加林等，以及从历史与现实的推进中完成性格的矛盾与统一的李顺大、胡玉音、徐秋斋等，并且，还有历史和现实的反面人物崇祯、田子诚、顾荣等等。显然，这些各色各样的形象，使新中国文学人物画廊色彩缤纷。

第三，少数民族文学的绚丽多采。

在我国领域宽广的大地上，聚居着55个少数民族。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各自创造了本民族的色彩鲜明、独具风格的文化，创造了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共同形成和丰富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因而新中国文学应该是一部各民族人民共同谱写的生动史诗，是一座各民族人民用自己无与伦比的聪明才智和团结精神共同建造的文学殿堂，它包蕴着多姿多彩的我国少数民族文学。

新中国建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贯彻下，不仅开发和整理了口头流传的大量的民间文学，而且形成了一支充满活力的少数民

族作家队伍。如纳·赛音朝克图、铁衣甫江、饶阶巴桑与晓雪、胡昭、包玉堂等的诗歌和《格萨尔王传》、《阿诗玛》、《百鸟衣》等著名的长篇叙事诗；以及小说家玛拉沁夫、李乔、陆地、霍达、敖德斯尔、孙建忠、乌热尔图等以及剧作家乌·白辛、周民震等。

四、新中国文学的经验教训

新中国文学运动40多年，所走过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又有许多失误；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

最需要记取的经验教训，“归纳起来，主要是正确处理三个关系问题：一个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其中包括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的问题；一个是文艺与人民生活的关系，表现在艺术实践上，也就是文艺创作上的现实主义问题；一个是文艺上继承传统和革新的关系，也就是如何贯彻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问题。这三个关系处理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成败兴衰。”这三条是周扬在1979年召开的四届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的，现在看来，至少还应再加上正确贯彻“双百”方针和正确开展文艺批评这两条。这五个方面的问题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文艺与政治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决定于经济基础，并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文艺既不从属于政治，又不能脱离政治，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把“文艺从属于政治”当作指导性的口号。不可否认，这个口号曾起过积极作用，取得了重要的文学成果。但这个口号本身，在理论上是欠科学的。因为文艺与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并列的，

而不是从属的。在实践上，也出现过偏差与错误：

首先，混淆了文艺问题、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的界限，在开展思想文化批判时，采取了政治运动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如建国后开展的五次文艺思想批判，就是这种情况。

其次，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变成为中心工作服务，为政治运动服务，为某些方针政策服务。把“写中心、唱中心、画中心、演中心”当作口号来提，这当然是片面的。文艺固然可以较直接地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但这只能是文艺的一项功能，绝不是全部功能。文艺是生活的反映，政治生活只能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把“写中心”当作口号提，就会把文艺创作拥挤在一个狭窄的胡同里，影响文艺的发展。

再次，会导致文艺独立品格和特征的丧失。文艺应当是通过优美的艺术形象对社会生活作审美反映，文艺创作又是作家个人的精神劳动。如果以“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强行要求文艺去为中心任务服务，以长官意志去领导文艺，对文艺横加干涉，就会阻碍文艺的发展。

值得注视的是，在80年代却出现了“文艺脱离政治”的不良倾向。文艺与政治虽然同属于上层建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并列的，但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占首要地位。它同文艺之间又不是同等的。文艺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往往要通过政治作“中介”。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当作口号提当然不妥。但不能否认，在阶级社会里，文艺为政治服务是文艺的一项重要职能。有人却宣扬文艺应该离政治远一点，文艺应该回复到文艺自身，提倡文艺的非社会性。这种“淡化”、“远离”政治的观点，就导致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创作中泛滥。

第二，正确认识和处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

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文艺是社会生活的能动的审美

反映。作家的创作，要忠于生活，真实地反映生活。文艺作品，又可以反作用于生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表现在艺术实践上，就是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问题。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按照生活固有的样子来反映生活。我国“五四”以后，现实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革命现实主义。新中国建立后，革命现实主义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流。许多作家深入到人民生活中去，密切了同人民生活的联系，创作了一大批具有革命现实主义精神的优秀作品。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写真实”的口号被否定，现实主义的文艺观点被批判。特别是在10年动乱期间，“四人帮”变本加厉地批判“写真实”、“现实主义深化”等文艺观点，鼓吹“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等反动谬论，完全颠倒了文艺同生活的关系，致使瞒和骗的文艺作品泛滥成灾，现实主义几乎趋于湮没。粉碎“四人帮”后，“写真实”的口号重新被肯定，革命现实主义得到恢复，社会主义文学又获得新生。

然而，到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艺思潮几度泛滥。有些受自由化影响的人，否定了社会生活对文艺的决定作用，对“深入生活”提出了疑问，提出什么“远离生活”论，他们片面强调文学的主体性，鼓吹“自我表现”，甚至对列宁的反映论也加以否定。这些唯心主义的观点，导致作品离生活越来越远，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歪曲社会主义现实的坏作品。

第三，正确认识与处理文艺领域中继承和革新的关系。

正确处理继承传统与革新创造的关系，就其实质来说，是如何贯彻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的问题。继承前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借鉴外国文学的先进经验，是发展民族新文学的必要条件。但是，继承和借鉴必须坚持批判的原则，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同时，继承和借鉴的目的是革新创造。没有革新创造就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学。建国40多年来，从总体上说，基本上贯彻执行了正确方针，取得重大成果。但也出现

了两种不良倾向。

一种是“左”的全盘否定的倾向。具体表现在，对我们民族的优秀的文学传统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对外国文学的先进经验，采取盲目排外的保守主义态度。“四人帮”炮制的“彻底扫荡论”，使这种不良倾向发展到极点。另一种是“全盘继承”、“盲目搬用”的右倾倾向。对本民族的文化遗产，不区分精华糟粕，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对外国文学，盲目崇拜，机械照搬，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时，有人甚至提出西方的现代派是我国文学的发展道路。在创作上也出现了一些机械模仿现代派，歪曲社会主义现实的作品。这两种倾向，都会阻碍文学发展的。

第四，正确理解和贯彻“双百”方针。

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文艺和科学领域的体现，是发展文艺和科学事业的基本的长期性的方针。这个方针提出后，就在文艺界、学术界引起热烈的反响，很快出现了一个文学创作繁荣、学术空气活跃的大好局面，显示了“双百”方针的作用和意义。但在贯彻这一方针的过程中，也受到“左”的和右的两个方面的干扰。“左”的方面主要表现在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对待文艺问题和学术问题，完全背离“双百”方针基本精神。在50年代，这种“左”的倾向就已存在，到10年动乱时期，“四人帮”彻头彻尾地践踏“双百”方针，致使当时的文艺创作，出现一片空白。粉碎“四人帮”后，这个方针重新得到认真贯彻执行，使文艺园地出现繁荣景象；右的干扰主要表现在企图摆脱党的领导，背离社会主义的自由化。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时，有人认为，既然执行“双百”方针，就可以随便反对和否定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这些观点，对文艺创作和学术发展是极其有害的。

“双百”方针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它是在“二为”方向下的“齐放”，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争鸣”，把“双百”方针看作抽象的、无原则的方针，完全是错误的。

第五，必须加强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正确开展文艺批评。

文艺理论与批评，是在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给文艺创作以指导。好的文艺理论与批评，能促进文艺的发展；反之，坏的文艺理论与批评，能阻碍文艺的发展。新中国四十多年来，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是很深刻的。

前17年，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错误地批评了许多作家、作品和文艺观点，使文艺的发展受到影响。到10年动乱时期，左倾错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几乎把所有的作家，都打成“黑帮”，把所有的优秀作品，都当作“毒草”铲除，把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文艺观点，当作“黑论”批判。与此同时，“四人帮”又大肆鼓吹“文艺黑线专政”论、“三突出”论等反动文艺观点，致使10年动乱时期的文艺园地，形成了百花凋零的荒凉局面。

然而，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时，有人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诋毁毛泽东文艺思想，鼓吹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而且还肆意吹捧自由化的文艺作品，致使文艺创作走向邪端。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界，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是坚决抵制与斗争的。但几起几落，受到严重挫折，直到1989年“六·三”事件后，才全面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清理当代文学中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使文艺创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